

减税激励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杨琳*

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鞍山,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本文以2014-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以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作为调节变量,全面探究减税激励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在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中发挥调节作用,即内部控制水平越完善,分析师关注度越高,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越显著。因此,我国应加大减税力度,企业也需主动作为提升发展效能,健全内部控制体系,积极对接资本市场外部监督资源,通过政策支持与企业内生动力的协同发力,全方位助推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实现质的提升。

【关键词】减税激励; 企业创新; 内部控制; 分析师关注

1. 引言

全球经济格局错综复杂,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综合实力角逐的核心。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的根基,2024年其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4.9%,在财富创造、就业保障、产业升级和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创新能力提升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支撑。我国制造业虽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但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创新活动的高风险特性导致市场机制失灵,企业难以实现最优创新投入,这成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的阻碍。

在此背景下,结构性减税政策成为破解关键,减税政策旨在通过调节企业税收负担、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破解市场失灵困境,而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治理核心,分析师关注作为资本市场外部监督力量,共同对减税释放的资金流向与使用效率形成双重约束。不过,这一政策能否精准落地、实际效果是否契合预期目标,仍需结合理论机理分析与扎实的实证检验予以明确回应。

2. 研究假设

2.1 减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减税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企业资源的角度来看,减税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的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提升企业当前的可支配现金流[1],为企业创新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二是从信号传递理论的角度来看,减税政策向市场发出了积极的信号,

市场投资者可能将减税视为企业经营状

况良好和政府支持的积极信号。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企业的信誉与声望,增强投资者信心,也缓解了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减轻企业融资约束。三是从创新动力视角进行分析,减税政策通过构建政府与企业共担创新风险的机制[2],有效缓解了企业管理层对创新项目高风险性的顾虑,强化企业创新投资意愿[3],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周期长、风险高但潜在回报大的创新项目。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

2.2 减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的调节机制分析

2.2.1 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内部的一种监督和激励手段,对于公司治理完善有着重要作用。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降低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委托代理问题[4],减少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对企业资源的侵占,使企业能够将更多资源合理配置到创新活动中,释放被低效占用的资源,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5]。从信息传递理论视角出发,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增强企业透明度与财务可靠性,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一过程可显著提升企业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进而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使企业能够将获取的资金投资约高风险的创新项目。最后,由于企业创新往往面临较高的失败风险,而内部控制通过对生产经营全流程的监控,以及对战略风险、经营风险的系统管理,能够有效降低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创新成功率。

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2: 内部控制能够强化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

2.2.2 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分析师关注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外部治理手段，是内部治理的有效补充，能在减税激励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创新活动的长周期、高不确定性与高失败风险，加剧了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既让外部投资者难以评估创新潜在收益，也可能导致减税资源误用，还会引发企业融资约束，制约创新动力与效果。而分析师可发挥信息中介作用，跟踪甄别企业创新信息，降低信息壁垒，助力市场精准识别创新项目价值，同时缓解融资约束，提升管理者创新投入意愿与能力，且关注度越高，企业创新水平往往越高[6]。此外，

分析师作为外部监督力量，能抑制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减少私利攫取，缓解代理冲突对创新绩效的负面影响[7]。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 3: 分析师关注能够强化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4-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原始数据做了以下处理：（1）剔除 ST、PT 以及*ST；（2）剔除存在缺失值的研究变量；（3）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99% 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 11058 个有效研究样本。其余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

表 1. 变量定义

| 变量种类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 被解释变量 | 企业创新 | RD | 研发支出/总资产*100 |
| 解释变量 | 减税激励 | lnTax | Ln【(名义税率-实际税率)*利润总额】 |
| 调节变量 | 内部控制 | IC | 迪博内部控制指数/100 |
| | 分析师关注 | Attention | Ln(关注该公司的研报数量+1) |
| 控制变量 | 流动比率 | Liq | 流动资产/总资产 |
| | 资产负债率 | Lev | 总负债/总资产 |
| | 企业年龄 | Age | ln(当年年份-企业上市年份) |
| | 企业规模 | Size | ln(企业总资产) |
| | 资产净利率 | Roa | 净利润/总资产 |
| | 企业成长性 | Growth | (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
| | 股权集中度 | Top1 |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
| | 固定资产比例 | Far | 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 |

3.2 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水平指标的构建主要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展开。本文参考严若森等（2020）的做法，选择用研发支出与总资产之比乘以 100 来衡量企业创新投入强度[8]。

3.2.2 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陈远燕等（2018）的方法衡量减税激励：以 25% 为名义税率，实际税率取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之比，二者差额乘以利润总额得减税总额，对其取自然对数消除量纲[9]。鉴于减税政策存在实施时滞，为精准捕捉政策影响的动态特征，本文对减税激励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3.2.3 调节变量

本研究中包含两个调节变量，内部控制

（IC）和分析师关注（Attention）。本文选用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并将其除以 100 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该指数越大，代表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关于分析师关注的度量，本文借鉴关静怡等（2020）对于分析师关注的衡量方式，采用年度内对同一家上市公司进行关注的研报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作为分析师关注的代理变量[10]。

3.2.4 控制变量

为规避因遗漏关键变量可能对企业创新活动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借鉴相关研究的通常做法，本文设计的模型中还包括以下控制变量：流动比率（Liq）、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资产净利率（Roa）、企业成长性（Growth）、股权集中度（Os）以及固定资产比例（Far）。

变量定义表见表 1。

3.3 模型设定

为检验减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

$$RD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Tax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mu_i + \omeg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RD_{i,t} = \beta_0 + \beta_1 \ln Tax_{i,t} + \beta_2 IC/Attention_{i,t} + \beta_3 IC/Attention_{i,t} * \ln Tax_{i,t} + \sum \beta_j Control_{i,t} + \mu_i + \omeg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ln Tax_{i,t}$ 表示解释变量减税激励， $RD_{i,t}$ 表示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水平， $Controls$ 包含所有控制变量，下标 i 表示企业， t 则表示年份。 α_0 表示常数项， μ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ω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减税激励与内部控制的交互项 ($\ln Tax * IC$) 以及减税激励与分析师关注度的交互项 ($\ln Tax * Attention$)，用以检验内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基准回归

| VARIABLES | (1) | (2) |
|--------------|---------------------|-----------------------|
| | RD | RD |
| lnTax | 0.041*** (4.37) | 0.099*** (9.77) |
| Liq | | -0.058*** (-6.60) |
| Lev | | -0.402*** (-3.22) |
| Age | | -0.109** (-2.36) |
| Size | | -0.445*** (-14.63) |
| Roa | | 0.353* (1.79) |
| Growth | | 0.139*** (4.80) |
| Top1 | | 0.187 (1.07) |
| FAR | | 0.880*** (5.92) |
| cons | 1.802*** (11.57) | 4.587*** (17.89) |
| Observations | 11058 | 11058 |
| R-squared | 0.081 | 0.123 |
| F | 87.048 | 73.044 |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0$ 。

表 2 为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实证回归结果。第 (1) 列未加入控制变量，减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041，在 1% 水平下显著，初步验证假设 1。第 (2) 列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后，核心解释

考察内部控制和分析师关注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了如下个体和年度的固定效应模型：

变量 $\ln Tax$ 对被解释变量 RD 的回归系数为 0.099，仍在 1% 水平下显著，证实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呈正相关，对企业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 1 成立。

4.2 调节效应分析

4.2.1 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核心，能营造创新友好环境、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融资能力，从而获得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创新。为检验假设 2，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引入减税激励与内部控制的交互项 ($\ln Tax * IC$)，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该交互项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内部控制可强化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2 成立。

4.2.2 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

表 3.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 VARIABLE | (1) | (2) | (1) | (2) |
|-----------------|--------------------|--------------------|--------------------|--------------------|
| | RD | RD | RD | RD |
| lnTax | 0.100*** (9.85) | 0.099*** (9.69) | 0.091*** (8.89) | 0.092*** (8.95) |
| IC | 0.016* (1.75) | 0.018* (1.93) | | |
| lnTax*IC | | 0.014*** (2.60) | | |
| Attention | | | 0.054*** (5.45) | 0.053*** (5.43) |
| lnTax*Attention | | | | 0.009* (1.79)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Observations | 11058 | 11058 | 11058 | 11058 |
| R-squared | 0.123 | 0.124 | 0.126 | 0.126 |
| F | 69.172 | 65, 930 | 70.858 | 67.314 |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0$ 。

分析师外部监督可与企业内部控制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助力企业创新。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较高的分析师关注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拓宽融资渠道，还可通过外部监督缓解代理问题，强化减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为检验假设 3，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减税激励与分析师关注的交互项 ($\ln Tax * Attention$)，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该交互项在 10%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分析师关注可强化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3 成立。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 2014-2023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减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二,内部控制和分析师关注能够正向调节减税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5.2 政策建议

第一、在当下经济处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企业发展遇新困难,政府更应加大减税力度,减轻企业税负、释放现金流,助力企业抵御风险、稳定经营,联动实现“稳企业、稳就业”,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

第二、企业要主动作为提升发展效能。合理运用减税资金投入研发、引才及产学研合作,制定差异化创新策略;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加强研发、资金、财务等关键环节管理监督,发挥内部审计作用,保障制度有效执行;完善信息披露,引入第三方鉴证,提升透明度,优化研发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1]谭雪,李婧萱.减税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脱实向虚[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3,20(03):82-91.
[2]张传奇,孙毅,芦雪瑶.现金流不确定性、管理者风险偏好和企业创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06):71-81.

[3]李艳艳,王坤.企业行为约束下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04):102-105.
[4]曲晓辉,王俊,张瑞丽.税率优惠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研究[J].财会月刊,2022,(12):16-25.
[5]陶黎娟,林静蕾,曹淑霞.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25,44(03):141-150.
[6]陈钦源,马黎珺,伊志宏.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国的逻辑[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3):15-27.
[7]余明桂,钟慧洁,范蕊.分析师关注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7,39(03):175-192.
[8]严若森,陈静,李浩.基于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中介效应的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20,17(08):1188-1198.
[9]陈远燕,何明俊,张鑫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产出结构——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证据[J].税务研究,2018,(12):48-54
[10]关静怡,朱恒,刘娥平.股吧评论、分析师跟踪与股价崩溃风险——关于模糊信息的信息含量分析[J].证券市场导报,2020,(03):58-68.